



受访者供图

学术评价最大标准是「心中那杆秤」

■本报记者 陈彬

自 2012 年加入浙江大学，历任访问学者、社会学系学科建设首席专家、社会学系系主任、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等多个职务后，不久前，赵鼎新离开了浙大社会学系系主任的岗位。此后，他又以一封公开信的形式，辞去了所有和浙大社会学系有关的职务，此举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在加盟浙大前，赵鼎新长期在世界社会学研究的顶尖学府——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对国内的学术研究现状尚无深刻了解。海归 10 年的经历给了他一个新的观察窗口。对于目前的国内学术生态，他有了自己的思考。

“在某些领域，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依然缺乏‘专业感’。”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赵鼎新说。

最大的遗憾：太累了

《中国科学报》：在浙江大学主持社会学学科建设工作的这些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赵鼎新：这些年我的收获还是很多的。

相较于其他学科，社会学在国内起步并不算晚，民国时期就有很大的发展，但社会学的学科复建却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的。受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趋势影响，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学发展往往更注重“工具”属性，在研究方法上也偏“工科化”。

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比如，更侧重研究发生在中国内地的具体社会问题，在方法上更侧重定量，特别是以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为基础的研究等。但事实上，不管是刚刚兴起之时还是当下，社会学更大的价值其实是给其他学科提供一种“母语法”。

比如，新闻传播学、管理学、商学等学科，其早期的许多经典理论都源于社会学家发展出来的各种分析视角和叙事语法，并且至今仍不断从社会学汲取理论滋养。从这个角度说，社会学承担的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母学”角色，它具有很大的基础学科属性。

这也是我在浙大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拓展社会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作用，弥补浙大基础学科较差这一薄弱环节。

另外，虽然中国先哲思想中不乏社会学思维，但是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却源于西方。这使得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课题还是在分析语法层面，都大量模仿西方，缺乏自身特色。在研究视野上也是更多集中于我国内地，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国外的社会学研究相对不足。对此，我希望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在浙江大学主持社会学学科建设工作多年后，赵鼎新离开了浙大社会学系系主任的岗位。但这些年的工作经历，给了他一个观察和深入思考中西方不同学术生态的窗口和契机。作为不同学术环境的亲历者，赵鼎新究竟有哪些感悟？

拓宽至边疆和海外，进而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乃至话语体系。

应该说，多年来，上述工作一直是我的努力方向。如今，虽然还没有完全达成我的设想，但已经取得很多成绩。

比如，目前浙大社会学系师生的研究视野不但深入到我国边疆地区，而且拓觉到美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南亚和非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多年轻学者的论文和著作已经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浙大社会学系也在国际上有了相当的知名度，这是很值得骄傲的。

《中国科学报》：除成绩外，你有哪些遗憾？

赵鼎新：最大的遗憾就是太累了。毕竟我们所做的事具有一定的开拓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某些既定制度和规则产生摩擦，从而在客观上大大增加我们的探索成本。

比如，为了避免学生和导师建立各种依附关系，我们在人才培养的探索中，规定博士生不是由某个单独的导师指导，而是由导师团集体指导。这项改革虽然得到了校方的同意和支持，但在执行层面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按照博士生培养“谁是导师谁出钱”的传统制度，导师团中该由谁出钱成了绕不过去的问题。这致使博士生乃至硕士生的大量培养经费最终不得不由系里承担。

再比如，我们有些老师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时很难申请到国家层面的课题。为了支持这些研究工作，我们不强行要求青年教师在预聘期内申报课题，但是这类“不合时宜”的规定，其阻力之大也是可以想象的。

这些年，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的工作中并不少见。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难，那就是不要将教师的升迁与课题的“层次”和数量简单挂钩。事实上，这也是国际顶尖大学通行的做法。

学术界缺乏“专业感”

《中国科学报》：你在中西方均工作了多年，对比彼此的学术生态，你认为有哪些不同点？

赵鼎新：近些年，我国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必须承认，相较于那些学术氛围和学术积淀更加深厚的国家，我们在很多领域依然缺乏一种“专业感”。

以社会学为例，“专业感”的重要性可以从很多方面理解。比如，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必须懂得，虽然社会非常需要社会学思维，但社会不一定需要社会学以“社会学系”的方式存在。因此，为了保持社会学专业的生命力，我们必须非常珍惜自己的学术荣誉和学术责任。

角、观点，并且分析手法老旧，就肯定不会有太大的价值。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应该如何提升学术队伍的这种“专业感”？

赵鼎新：在全国层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很难一概而论，但从我们的工作出发，有三点经验可以借鉴。

一是在青年教师的论文发表上，要看重质量和学术个性发展，而非数量；二是主要请来自外校、人品和学问俱佳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进行学术把关；三是不将课题和任何名号作为学术考核的标准。举一个极端例子，即使某位青年教师拿到了多个国家级学术称号，这些称号也不会成为其在我们系晋升的重要指标。

要先获得内心的自由

《中国科学报》：你曾提到，希望用自己的后半生为年轻人营造一个相对自由的研究环境，你所指的自由环境是什么样的？

赵鼎新：在我的理解中，所谓自由环境首先在于内心，或者说学者的心中有没有“自由”。说得更通俗一些，目前很多学者考虑最多的并不是自己的学术志趣，而是什么样的研究课题更容易发表文章和申请项目、哪本期刊的标准更松、文章写成什么样式更能打动编辑、哪类学问更能名利双收……当这些功利性的想法主导其研究时，学者便将自己束缚住了，导致其在学术研究上畏手畏脚、瞻前顾后，最终难成大事。

工作中，我非常支持周围的年轻学者摆脱内心的这些束缚，同时，我们也招收了不少研究“冷门”议题的学者。这些学者往往并不是文章发表的“大户”，但我们愿意为其提供相对宽松的空间。

此外，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一直强调尊师重道、提倡长幼有序，这当然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并不意味着对此应刻板地遵守。

比如，在很多高校的院系中，青年教师“怕”大牌教授，不敢与他们接触，甚至在他们面前唯唯诺诺的现象并不鲜见，对此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并营造一种平等、轻松的氛围。

我担任浙大社会学系系主任期间，年轻教师背后称呼我为“老赵”的大有人在。对此，我非但不生气，反而会在他们未能及时“改口”时，与其开玩笑：“既然背后都叫了，便当面接着叫呗。”

再比如，我们搬入新办公楼时，按规定我可以使用 75 平方米的办公室，但我坚持包括我在内的每位教师都使用相同大小的办公室。结果是除了极个别老教授外，系内教师的办公室均为 15 平方米。此举同样是为了营造一个平等的小环境。

《中国科学报》：你刚才提到的问题与当下的人才评价标准是否有关？

赵鼎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做一下中西对比。

欧洲情况我没有全面了解。据我观察，美国高校并不存在统一的教师考核评价标准。一般来说，越不在“领航道”上的高校，其对教师的考核标准越多、越“硬性”；那些顶尖美国高校则几乎没有硬性性的考核标准，只要院系内的同事公认某位教师的水平高，即便是该教师并未发表多少论文或著作，依然会得到升迁。

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期间，从长聘副教授一路升至正教授，再到讲席教授。其间，我在出版英文版《儒家国家》一书前，并未发表很多文章，更多凭借的是与同事日常交流时所赢得的学术口碑。

从这个角度说，学术评价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看似千头万绪、五花八门，但最关键的标准反而是每个人心中的那杆“秤”。

反观大部分国内高校，其教师评价依靠的依然是各种“硬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属于“无奈之举”，毕竟如果不靠指标，学术团队中的“学术守门人”必须足够权威且公正。但目前，我们缺乏这样的“守门人”以及相关环境。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这是否是目前“破五唯”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

赵鼎新：事实上，在国内学术界，我们对于本领域内同行的学术水平都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比如，浙大社会学系便请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组成了学术委员会。他们的资历、视野和操守

院士授课 高中接轨大学 培养高中生学术志趣，复旦大学这么做

■本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3 月 23 日是复旦大学第四期“周末学堂——复旦大学拔尖学科高中先修计划”开课的第一天。在该校光华楼的一间教室里，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分子科学系教授彭慧胜正在讲述“神奇的高分子”。

讲台下，上海市实验学校学生卢慧雯听得津津有味。她对化学很感兴趣，此次课堂介绍的织物显示系统让她倍感新奇：“未来，人们也许不需要拿出手机便可以在衣服上看到路线导航，织物显示系统必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捷。”

此时，“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等课程正在不同的教室中同步进行。选课的学生均为上海不同中学的高一学生，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对应课程，以期感受大学课堂的氛围。

让更多对学术感兴趣的人才“冒出来”

近年来，随着我国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很多“卡脖子”的关键科技领域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变得越发迫切。这种需求反过来对人才培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人才培养需要怎样的体系化布局？基础教育应怎么做？高等教育应怎么做？不同阶段衔接的过程中，高等教育能够为基础教育做些什么？

脖子”技术。通过课程学习，他坚定了对工科的热情，并在 2023 年通过高考进入了复旦大学“工科试验班”学习。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学术志趣，让他们对这些学科和专业有更系统化的认识。”林伟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关注到一些学生的反应，比如‘抢’前排座位，在互联网上感慨课程坚定了自己对某方向的热爱、珍藏和老师送的合影或老师送的书等，这些都是很棒的反馈。”

多措并举培养“学术志趣”

在大学里，如何开好一批“高中课程”？

林伟强调：“我们不能仅将大学的知识直接‘搬’过来，还需要符合现在高中生的特点，在课程设计时注意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学术志趣，进而培养他们将知识应用到具体学术实践中的能力。”

为确保课程内容满足对高中知识的衔接和拓展的要求，复旦大学专门成立团队，对课程内容进行设计，从学科的不同模块进行分解，通过一系列课程构成整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以便学生对专业学科有初步的全貌性了解。

“一流的学科，一流的师资是我们办‘周末学堂’的前提。”林伟强调。

经过 3 年多的实践，目前“周末学堂”设置了包括文、社、理、工、医等 20 种“门类”在内的课程。课程内容也根据前几期的教学实践进行更新迭代，不局限于对知识点的解读，而是注重讲解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知识背后的逻辑体系，以及在解决问题中如何应用。

至于授课老师，不乏院士、文科资深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除了学术背景，他们往往具有给低年级学生授课的经验，能用适合高中生的方式教学。“很多老师获评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教学名师等，授课风格受到大家喜爱。”林伟补充说。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已经连续四年担任“周末学堂”的任课教师。“其实高中生和大学生并无本质差别，我非常愿意在课堂上和他们多讨论，希望能共同创造一个师生同频、活跃的课堂。”授课过程中，张军感受到了高中生对知识极强的求知欲，他希望有学生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开启学术研究的大门。

今年，复旦大学还进一步推出了暑期体验营模块，让学生在“做中学、践中悟”。体验营的具体内容根据课程而定——理工类课程将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教学实验中心等开展实验教学，人文社科类课程则有教会参与田野调查或 City Walk（城市漫游）文化探寻的活动。

林伟期待“通过学习和实践的结合，以及同任课老师间的沟通交流，有学生能凝练出一些有意义的学术问题，进而有意识地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尝试解决”。

构建教育衔接的“生态圈”

在我国，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衔接话题久已有之。早在 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就提出要树立系统培养观念，推进小学、中学、大学有机衔接，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

近年来，在落实这一方案的过程中，复旦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人才早期培养的生态圈，而生态圈的核心是多样性。”林伟说，较之以往的举措，“周末学堂”的覆盖范围更广，任何一名上海市的高一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

一方面，在国家人才培养的大背景下，选修“周末学堂”的学生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在某个学科领域颇具“悟性”的潜在“拔尖创新人才”。对这类人才的早期发现，可以让他们有机会更早期地将时间、精力从“卷”分数中释放出来，聚焦更长远的学术能力培养，进而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储备人才。

另一方面，通过课程学习，学生也能有机会走进大学校园和课堂，对学术研究有初步的认识。

“即便自身能力很强的学生，如果失去方向的指引，也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如果通过选修‘周末学堂’，学生们树立对大学及其所选专业的认同感，激发学术志趣，无论他们最后去哪所高校，都有助于其成长。”林伟期待，“未来‘周末学堂’能够更具品牌效应，有更多高中生、大学老师参与进来。”